

親在哈里街有了房子，成了麻醉師。在我們的家族中，有沿用『約瑟夫』這個名字的傳統。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名字。我母親是音樂家，也是作曲家，名叫艾莉西亞·阿德萊德·尼達姆，舊姓蒙哥馬利。母親當時很有名氣，在近衛軍樂隊中擔任指揮。她創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，如《我的黑玫瑰》這首歌差一點兒被選為愛爾蘭的國歌。

父母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和諧，慢慢地我也感覺到了。至今還記得，小時候有一次，母親敲打著父親診所已上鎖的門窗，埋怨讓我識字太早。這樣的爭吵在屋裡常常可以見到。那時我可能有六歲了。父親有間很漂亮的書房，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讀到一些書。其中，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《哲學的歷史》這本書，至今我還保存著它。

我深深為父親的治學精神所打動，所以有意識地模仿父親。但是，後來又覺得從母親那裡也受益匪淺。如果說只受到父親的影響，那麼我恐怕就很難致力於像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這樣龐大的課題了。在昂德爾公學學習時，校長桑德森的諄諄教導也帶給我極大的影響。在十四歲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，我被選進了這

所公學。校長先生常常對我說：『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。』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這一研究課題，我想就是『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』的最好實例。他還常常對我說：『如果你能找到激勵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，那麼你就能把它幹好。』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就是我所找到能讓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，而且也可以說實現了。這些情況，還是另找機會再談吧！在昂德爾公學，其實也並不太快樂。我這樣說是因為這所公學把重點特別放在體育運動上。那時，我編了一本名叫《鐵房子》的家庭雜誌。到了學校放假的時候，就跟父親到懷爾醫院、第三倫敦綜合醫院以及喬治皇家醫院。我在那兒當手術助手，做著給外科醫生遞縫合線和鉗子之類的工作。我第一次看到動手術是九歲的時候，那是由布蘭德主刀的闌尾切除手術。對於我看到血沒有暈過去的表現，父親非常滿意，給了我幾枚金幣。後來，真正合格的醫師嚴重不足，以致於誰都能從事醫療工作，我也被捲了進去。說老實話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，看到過許許多多的手術，而且有些外科手術簡直就像是做木工活兒一般的粗糙。我自己想進一步學習，想做

更為複雜的工作，因此就沒有成為外科醫師。

我是個獨生子，無法依靠兄弟姐妹，但我想誰都能扮演橋樑的角色。我這樣說，是因為許多孩子常想促成父母和好，但多沒有實現，所以令我想起中間人的作用，從中搭橋，從中調解，發揮溝通的功能。再譬如，我大學時代想在學問與宗教間架起橋樑；緊接著後來，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學學者，想在形態學與生物化學間架起一座橋樑；再後來我就決定為中國和西歐架設橋樑了。」

宗教信仰

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勃魯在《李約瑟及其研究成果》裡這麼寫李約瑟：「……父親是一位醫學博士，後來成為倫敦哈里街最早的麻醉專家之一，從父親那兒，李約瑟培養出鑒賞法國文化的極佳能力，並學會對宗教持堅定的現實主義態度。這種宗教態度對他後半生的世界觀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影響。

……1924年，李約瑟博士與莫伊爾(Dorothy Mary Moyle)小姐結婚，她也是一位劍橋大學天賦很高的生物化學家，撰寫過關